

回應萬毓澤教授的評論（二）

汪宏倫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萬毓澤的這篇「非典型書評」（以下簡稱「萬文」），意外促發我們思考：書評是什麼？

作為學術期刊中的一種文類，書評不比正式論文，一來沒有固定寫作格式，二來也不被當成「業績」，僅可說是一種「學術服務」，評者幫大家讀書，把最新出版的專書評介紹給讀者。從這個角度看，萬毓澤願意花時間為《戰爭與社會：理論、歷史、主體經驗》寫書評，再怎麼說都是令人感心的事，至少表示這本書值得一評。不過，作為這本書的主編，讀到這樣一篇書評，心中難免有幾許失落。

書評儘管無固定格式，也沒有人規定書評應該怎麼寫，但讀者對書評總有期待。在一般的情況下，我們期待從書評當中得知這本書的主要內容、在當前相關議題或領域的定位、以及對其學術貢獻的評價等。然而，目前這篇書評幾乎沒有述及整本書的全體內容，僅針對其中兩三篇（尤其集中在朱元鴻的論文）的部分論點針砭評論。因此，面對這樣的「書評」，讀者很容易覺得和一般的期待有不小落差。

固然，要評價一本非單一作者的專書，誠非易事。要評者全面地就每一篇文章深入評論，恐怕有點不切實際。但畢竟這不是一本隨機湊合的「會議論文集」，而是經過多年努力醞釀的集體創作（這是筆者在本書的〈序〉與〈導論〉中再三強調的），因此，針對這個集體努力的整體貢獻或缺失（而非僅針對個別論文）做出評價，應是讀者對書評的合理期待。如果書評者能勾勒全書架構與收錄各章的大致面貌，概述這些篇章乃至整本書在相關學術領域中的定位與貢獻（或侷限），無疑更能幫助讀者理解與評價這本書。

公允地說，萬文對此並非毫無著墨，只是極少。作者先在一開始定位本書是「台灣（甚至華語學界）第一本全面論述『戰爭與社會』各層次關係的專著，具有里程碑的意義」，而到了文末的倒數第二段，他則指出本書的不完備之處，在於少了一篇從演化的角度來探討「戰爭與社會」的理論文章，並據此論斷國內社會科學界在「跨學科」的對話上仍有努力空間。前者是對本書的肯定，後者則是個具建設性的意見，筆者欣然接受之餘，也想補充幾句作為回應。

《戰爭與社會》背後有幾個容易看出的預設：第一，我們是放在「現代性」的脈絡下來談「戰爭與社會」，對前現代的戰爭，本書基本上未處理，遑論把時間軸拉長到整個人類的演化史。事實上，萬文所引用的筆者〈導論〉文字已經清楚地說明本書預設的目標範圍，即「重新思考戰爭、認識戰爭、反省戰爭與各種形式的暴力在現代社會中所扮演的關鍵角色」¹。第二，儘管筆者的〈導論〉是從鄂蘭(Hannah Arendt)的《論暴力》(*On Revolution*)入手來展開整體論證，但我們的焦點集中在（集體）暴力的某種極端形式，也就是戰爭；如果把焦點放寬到暴力全體，那麼需要處理的議題將會更加繁複。這不但已非這本略顯厚重的專書所能承載，也將模糊原本想要凸顯的焦點。第三，作為一種人類社會現象，戰爭在不同學科有各種各樣探討方式與研究傳統，例如政治學與歷史學界處理戰爭議題甚多，各有其關懷旨趣。這本書仿效歷史社會學者 Theda Skocpol，呼籲「把戰爭帶回來」，是對社會學界喊話，主要設定的對象是那些傾向於忽略戰爭議題、或尚缺乏適當理論概念工具的人文與社會學界。即使如此，本書仍隱含著

1 一個值得一提的花絮是，筆者對萬文所提到的 Steven Pinker 與錢永祥等人的著作，其實並不陌生，亦曾有對話機緣。錢永祥針對 Pinker 的 *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 所寫的深度書評〈「道德進步」：一本書與一種歷史觀〉一文出版後，《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在 2012 年 5 月 5 日舉辦了一場論壇，針對 Pinker 的書與錢永祥的文章進一步對話討論。筆者躬逢其盛，並曾於會中公開發言質疑「人類暴力與戰爭隨著現代性的開展而逐漸減少」的命題。當時《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的主編謝世民邀請筆者將當時發言寫成評論，筆者後來因故未能成稿。如今思之，不無遺憾。《戰爭與社會》預設的出發點，恰恰是站在 Pinker 與錢永祥等人的對立面，而「人類暴力與戰爭究竟隨著現代性的開展而增加或減少」，的確是個耐人尋味的重要課題，值得未來進一步探究。

跨學科對話的努力，例如其中兩篇文章便是來自歷史學者與精神分析學者的貢獻。這些跨學科的努力本應被看到，卻因為萬文未能描繪全書概貌而遭到忽視。再者，這本書既然方是起步，必然無法從一開始就面面俱到，掛一漏萬在所難免。遙想幾年前筆者著手籌劃此書時，便邀請曾有師生之緣的萬毓澤君參與，惜未獲首肯。今日毓澤君藉由書評指出本書之不足與尚待努力之處，筆者非但不以為忤，反而頗感振奮。如筆者在〈導論〉中所說，「戰爭與社會」是個方興未艾的領域，值得更多學者重視參與，毓澤君盍興乎來？

以上是作為本書主編所做的回應。作為本書其中一篇的作者，筆者援引朱元鴻的「戰爭共產主義」概念，萬文不以為然，但其批評主要是集中在朱元鴻的論文上。對於「削足適履」、「線性敘事」等指控，朱元鴻已有回應。筆者此處既無需對號入座，更不必越俎代庖，只能說，這些都是從事歷史社會學研究的學者經常面對的批評，恐怕將會永無休止地爭辯下去²。

最後，回到「書評是什麼？」的問題。書評不僅是「學術服務」，也是一種對話。萬文雖非典型書評，但無疑在諸多議題與面向上都開啓了有趣的深度對話空間。如果藉由這本書所帶出的討論能吸引更多同儕加入對話，甚而投身研究，則當初編纂此書的目的，亦可謂庶幾近矣。

2 追根究柢，這背後牽涉到的其實還是個方法論上的老問題，也就是紛然雜陳的歷史現象有無可能透過某種特定的敘事框架或規律來加以理解（或這樣的理解是否恰當），或是這些企圖化簡取繁的理論概念是否能夠掌握高度複雜的歷史現實。關於中國的「戰爭共產主義」與「戰爭之框」，筆者另撰有〈理解當代中國民族主義：制度、情感結構與認識框架〉（即將刊登於《文化研究》），其中分析是否允當，讀者自可參考評斷。